

刘大年与佐藤猛夫重逢记

刘 红

1998年金秋时节，我有幸作为刘大年先生的陪同，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代表团赴东瀛访问。同以往相比，这次出访的一个最大收获，是意外地亲眼目睹中日两位老人晚年重逢的动人情景，使我感动不已。

一

两位老人，一位就是担任代表团团长的刘大年先生。

大年先生是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历史学家，也是一个位受人尊敬的长者。他已83岁高龄，还每天笔耕不止，在学海探索追求。他著书立说，提携后进，处处显示出一代大家学者特有的风范。出访前，一位知名学者同我谈到大年先生，他说：大年先生是一位长于理论思想的史学家。唐代刘知几写《史通》，论史家有：史才、史学、史识。刘大年先生大概属于史识一类。不过，根据我读大年先生的著作以及平日和他的接触，如果再加上清代章学诚在

《文史通义》标举的“史德”，似乎更为确当。

大年先生生于湖南省华容县一个中小地主家庭，6岁入小学，大部分时间念私塾。1936年于湖南国学专修学校肄业，1937年夏为寻找职业到了武昌。当时的形势是平津失陷，日军发动大举进攻，国家危在旦夕。抗日战争时局的大变动改变了国家的命运，也改变了个人的命运，他决定去延安。1938年从家乡到长沙八路军办事处，八月间到达陕北，进了陕北“抗日军政大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在抗日军政大学”第五期毕业后，分配到冀西和冀南敌后区工作，以后长期生活、斗争在河北平原和太行山上。

战争年代，即使在敌后区生活也是不安定的，常常流动、迁徙。但不管条件怎样不好，大年先生从不放下书本，走到哪里就把书本带到哪里，刻苦研读。他读的书很多，有马克思主义著作，有哲学、社会学、历史学著作。他回忆这段生活，还记得他读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原著是《共产党宣言》，读的第一批历史学著作是李达的《社会学大纲》、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吕振羽的《史前期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殷商时代的中国社会》及苏联人、日本人讲中国社会历史的书。如果说研读马克思主义作品，确立了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那么，研读史学则为他奠定了抗战胜利后走上史学研究道路的知识基础。大年先生的史学道路，从而铸就了战士型学者的素质。这种素质，仅仅依靠读史书是锻炼不出来的。

就是在大年先生铸成一个战士型史学家的生涯中，发生一段和这次访问具有戏剧性关系的生动故事。大年先生深情地回忆着这段生动的故事：

“七·七”事变六周年前夕，大年先生奉命来到河南涉县附近“北方局”太行分局所在地——赤岸。这是八路军129师驻地。与他同来的是中共冀南区党委组织科长刘国平，接待他的是干部科长刘建勋。刘建勋要他先休息一下，然后好好谈一谈。刘建勋并说他已经从刘国平那里知道了他希望去延安，或者在太行学习的想法，认为这两种想法都可以，但建议大年先生不妨休息几天，了解些情况再作决定。大年先生表示一切服从当局的安排。接着大年先生告诉刘建勋一个情况：上山以来忽然每天都咯几口血，已经连续三四天了。刘建勋促他赶快到师部医务室诊查。医务室的医生诊断是肺萎缩。大年先生觉得不一定准确。于是决定先到129师卫生部医院检查，再作决定。

八路军总部、北方局驻地，在涉县以北清漳河畔山西辽县（左权）麻田镇。涉县上溯清漳河到麻田约70华里。八路军总部卫生部与129师卫生部的野战医院前此已经合并，地点在更北面约30华里的隘峪口村。从赤岸出发，第二天中午以前就到达了麻田。

休养所所长看过太行分局的介绍信，由护士领大年先生到靠近村边的一间病房住下，等待安排检查。这里一共三间病房，只有一位病情不重的休养员。据他说，医院共分四个所，这里叫一所，医疗水平较好。129师卫生部就

位在河滩对面的东隘峪口村。大年先生此刻唯一希望是检查结果不是什么肺萎缩或肺结核这样严重的病，而能够平安去延安。

第二天早起一切如常，上午突然胸口发热，还没来得及想是怎么一回事，一股血流奔口而出，又从鼻孔往外喷。大约五分钟后血量才减少。护士看到这种情况，马上把所长找来。所长见到地上一大滩血，忙让大年先生静躺下来，要护士用凉毛巾敷住胸口，观察情况。大约两小时以后，血又大口往外冲，情形跟上次一样。大年先生忙用一路上吃饭喝水用的搪瓷缸接血，待吐血渐停，一看竟有近半缸的量。医生马上吩咐护士注射葡萄糖液。下午和往后两天，情况仍然没有好转，上厕所时甚至晕倒了，被人抬回病房。大年先生心想，书中常有某人“吐血而亡”的说法，此时自己面临的正是这种情况，如果不出现奇迹，恐怕延续不了几天了。不仅大年先生这样估计，实际上医生也是这样预测的。第四天上午，休养所的指导员来到病床前，这是一位当过红军的老同志。他关切地问：“你有什么话要说吗？”大年先生很平静的回答说：“没有”。然后又轻声地说了两句：“没有死在战场上，却死在医院里，有点遗憾。事后请通知我们单位一下。”指导员安慰他说：心放宽些，你的病我们会想办法治。又说：医院里医务主任白云，是个日本医生，很有经验，我们已经去请他了。指导员走后不久，白云主任、医生、护士一同来到病房。病人的情况，白云主任已经听别的医生谈过，又问了问，

回头对医生说，如果能够找到白阿胶，也许还有点希望。白云主任个子不高，显得很温和，会说几句简单的汉语。那位医生想了想说，医院以前好像有白阿胶，一个多月前藏到山洞里去，不知能否找到。白云主任态度十分坚定地说：一定要设法找到，没有别的办法。这位白云主任，后来知道他叫山田一郎，也就是本文一开始提到的两个老人中的那位日本老人。他的真名叫佐藤猛夫。

大年先生大出血第四或第五天以后，人已经奄奄一息，眼睛也快睁不开了。在这个紧急关头，医生终于从山洞里找来了一块拳头大小的白阿胶，对大年先生说：这都归你了。并嘱护士把它熬成浆，叫大年先生一天喝四五汤匙。等熬好后，护士把像浆糊样的满满一缸白阿胶放在大年先生面前。大年先生也不管味道难闻，管用不管用，头一天就喝了近三分之一，两天全喝完了。说也奇怪，出血居然渐渐减少。四五天以后，吐血竟完全停止了。大年先生原来不敢存太大希望的“奇迹”，看来终于要出现了。

西隘峪口村南一二百米有片杨树林，一条清浅的小溪沟从树林下穿过。轻微的伤病患者三三两两，常在树林下、溪沟边乘凉聊天。医生、护士偶尔也有来洗衣服或散步。大年先生吐血完全停止后，不需要卧床，但严重气喘。后来勉强一步一步移动，到树林中去，听人家聊天。病友们对大年先生的病情看法不一，多半认为白阿胶是不能止住肺结核出血的。有位病友还建议说：“你的病只有找钱部长才能确诊”。卫生部钱信忠部长医术高明，常常

为医院附近的农民治病，人们都称他为“活神仙”。大年先生问怎样才能找到钱部长？他们出主意说：你先找唐兮凤医生看病，漂亮的唐医生是钱部长的爱人。她解决不了，就会把钱部长找来。有一天恰逢唐医生到溪沟洗衣服，大年先生就跟她谈起看病的事。几天后，唐医生果然带着部长到他的病房。钱部长问明出血情况，仔细听诊胸部，斩钉截铁地说：“你的结核病不严重，大出血是人工破裂。”然后又说：破裂口不容易短期愈后，休息一段时间再看看吧。大年先生这才明白过来，何以上山以后忽然咯血？原来是在来的路上，因带路人带错了路，误走到山顶日军碉堡脚下，眼看天已拂晓，身处绝境，只得从悬崖陡坡往下跳。这样连续下跳、翻滚，造成肺部内伤，也就是钱部长所说的“人工破裂”。这个诊断对他来说太重要的。虽然肺结核疑虑没有完全排除，但至少不严重，心理负担大部解除，心情也就好多了。本来，战场上死人是不可避免的。当初决心到敌后来的时候，就准备要“马革裹尸”。能够和同处一个环境里的其他人一样幸存下来，不过是个偶然。这次与日军遭遇又把自己推到了死亡的边缘。只是碰上山田一郎、钱信忠部长两人，又幸运地活了下来。这难道不是奇迹吗？这个奇迹使得他存活下来，对他以后的生涯起了极大作用，是他终身难忘的。

大年先生后来同山田一郎有过几次简短交谈。对他的医术，除了他亲身的感受，也耳闻其他病人的好评。不久以后，他从西隘峪口转移到附近一处名叫石暴的小山村疗

养，便和这位有救命之恩的医生分离，此后也不知道山田什么时候离开医院的。想找到他，感谢他已不可能，从此心中总有一个未解的结。后经打听，知道山田一郎是八路军的俘虏，经过教育成为日本反战同盟成员，为反战工作。了解这些情况，大年先生更萌生希望与这位同志和朋友再见一面的迫切心情。

1963年12月，已经成为著名史学家的刘大年先生参加中国学术代表团访问日本。代表团团长张友渔因病临时住进代代木医院。按照接待实行委员会的安排，代表团访问日共总部，然后大年先生和侯外庐先生等一起去医院探视团长的病情。因时间仓促，没有余暇打听山田一郎情况，更没想到医院有什么可以留意的地方。不久，又举办国际“北京科学讨论会”，大年先生是中国代表团团员，钱信忠是副团长之一。老朋友见面十分高兴，在一次交谈中，大年先生问钱信忠部长，知不知道山田一郎的下落？钱答道：知道，他现在叫佐藤，是日共代代木医院的院长。听到这个消息，大年先生憾悔极了。在代代木医院，二人本来有机会见面，然而自己却毫无所知，真是失之交臂。十年“文革”内乱期间，根本没有联系的可能。后来又几次访问日本。但这时日共与中共又断绝来往，不便打听山田近况。只是心中时时怀念，每与人谈到抗日战争中的经历时，大年先生总要说：我在日本不只有学术界的朋友，也有战场上的朋友。这位战场上的朋友首先指的就是始终没有忘怀的山田一郎。当然，也包括在冀南敌后区一

起活动的反战同盟的朋友。

所以，这次大年先生率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中心代表团赴日访问，久盼与山田一郎重逢的机会终于来到，其心情之激动是可以想见的。而我恰好躬逢了这一动人的场面。

二

11月的日本湿润而温暖，好天气带给人好心情。11月10日上午，到达日本的第二天，我陪同大年先生拜会了山田一郎即佐藤猛夫先生。我们一行四人，大年先生和我，我们院日本所的高洪先生及日中友好会馆的尾形洋一先生。尾形是一个很热情的人，负责这次赴日代表团在日本的活动安排，大年先生和佐藤先生见面就是他牵的线。几个月前，大年先生托他代为寻找、联系。他按照大年先生提供的线索，很快就与佐藤先生联系上了，并在代表团赴日前先期拜访了他。一路上乘出租车前行，大年先生显得很兴奋、激动，和我们谈佐藤先生，说他的经历。也不断回答我们的询问。当他听到尾形说已见过佐藤先生，忙问：他身体怎么样？生活怎么样？尾形先生说：佐藤先生身体不错，只是前几年得过脑中风，说话行动有些迟缓，现在和夫人生活在一起，夫人身体很好，可以照顾他的生活。大年先生宽慰地说：“这很好，这很好”。并再一次对尾形先生的大力帮助表示感谢。还直说，佐藤先生救了

他。说话间，车驶到一条较宽的路上，不一会儿，又拐进一条僻静的街道，过了一小段又往右转，在一黑色木格门前停了下来。门框边有一行小字：目黑区三田—2—15—2。我留意到门前石板由于经常踩踏，很亮，很洁净。尾形先生前去叩门，一位女士应声拉开了门。我想这一定就是佐藤先生的夫人了。刚才在车上谈论时就听尾形说过佐藤先生 89 高龄，夫人也应是这个年纪的样子，没想到显得很年轻，白皙的皮肤，不胖不瘦，年轻时一定很美。后来谈话中她介绍自己已七十几岁。看到是约好的访客，夫人忙热情地把客人一一往门里让。按日本习惯，我们依次换了拖鞋，此时佐藤先生早已站在客厅门口迎接。一下子，两双八十几岁老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我赶快把相机对准他们，连连按动快门，唯恐漏掉这难得的极为感人的一瞬。接着大年先生又把预先准备好的鲜花捧送给佐藤先生，佐藤先生高兴地接过这束饱含深情的鲜花。他们的手再一次握在了一起，我马上又按动快门。此时我似乎变成一个熟练的摄影师，不是由于我有熟练的技术，而是因为我从这两双紧握着的老人的手上，感到一种内心的使命，我必须把这幕感动人的一刻记录下来，交还给历史。

随后客主落座，佐藤夫人拿出上好的日本清茶款待我们。大年先生和佐藤先生早已经过翻译高洪热切地交谈起来。

佐藤先生的家十分雅致，房屋不大但干净、整洁。客厅迎面墙摆放一排书柜，装着满满的书。中间沿茶几摆着

一圈日式沙发，右侧窗台柜上摆着淡粉色的干花，门口右侧摆着一架钢琴。为不影响他们谈话，征得女主人同意，我就坐在钢琴旁自动做起了记录。

佐藤先生个子不高，瘦瘦的，带了一副眼镜，虽说89岁了，前几年又得了病，动作有些迟缓，但仍显得很有精神。大年先生回忆说他怎样受伤，怎样到八路军医院，怎样由白云主任看的病，特别提到白阿胶的奇迹，及钱信忠部长又怎样做了诊断等等。听了这些，佐藤先生的眼睛泛起亮光，激动地插话说：“我那时确实用白云这个名字。只用了很短时间，知道的人很少。”这时大年先生也显出少有的激动，便说：“这就对了，当年我们在隘峪医院相识，这是确凿无疑的了。感谢，感谢。”他们不约而同地再一次紧紧握起了手，久久没有放下。大年先生原本还有一些担心，释放了。毕竟时隔55年半个多世纪，谁能保证对过去的一切都记得那样清清楚楚呢？佐藤先生救治过那么多伤病患者，怎能记住所有的病人。正如大年先生在他回忆佐藤先生的文章中所说：“医生天天给人看病，不可能记住患者谁叫张三李四；相反，病人由于亲身感受，很容易记住医生，不论是庸医、名医。”佐藤先生未忘记这件事，足见这段经历在他一生中所占的位置，大年先生给他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他们共同回忆着在八路军医院的生活工作情况。谈到原卫生部长钱信忠先生，佐藤先生说：“记得那时我和钱部长是上下级关系，他总把自己称为四万万同胞之一，我也就把自己称为四万万同

胞之一。60年代钱部长邀请我到中国大陆访问，见到了他，我非常高兴。时隔多年，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大年先生说：“他身体很好。他曾到苏联学习卫生行政，后来当了多年的卫生部长，还授了少将军衔。前几年因为他计划生育工作有功，得了联合国人口奖。这两年退休在家。”佐藤先生听后颇有感触地点点头，目中散发了一种欣慰的光芒，表现出他对这位老上司的敬仰和情谊。大年先生接着说：“当时我是病人，接触许多医院的负责人，他们都没有把佐藤先生当外国人。我还讲个故事，请夫人见谅。那个时候佐藤先生是一个人，在中国叫光棍。”说到这里，佐藤插话说：“其实我参军前一周才结婚，被俘后加入了八路军。”大年先生说：“可中国人认为您是‘光棍’。那时医院有个护士很漂亮，想介绍给先生，不知夫人知道不知道？”听到此，大家都笑起来。大年先生诙谐地说：“这个故事说明中国人没有把佐藤先生当外国人着”。

接着佐藤先生让夫人取来一本厚厚的发黄的旧相册，翻到其中一页，指着一张照片对我们说：“这是我在八路军时在延安宝塔前照的照片，当时是日本人民反战同盟成员。1942年我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按规定要考验一年，1943年6月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听到高洪翻译出“考验”一词时，我们又都会心的笑了。数十年来，无论是在战时还是在和平年代，无论是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或在敌后从事革命斗争，亦或在和平年代的工作岗位

上，要加入党的组织或团的组织都要经过“考验”，所以“考验”这个词，是人们常常使用的。但这个词从一个外国人嘴里说出来，感到特别新鲜。听的人，或许觉得有趣，但说的人，它却是一个很有份量的词。照片中的佐藤先生，当年的白云主任、山田一郎先生，身着八路军军装，目视前方，眼中透出一股坚毅的神态。看着照片，时空似乎发生了倒流，人物活动起来了，我也仿佛看到了佐藤先生活跃在八路军医院为伤病患治病的情景。

两位老人谈兴愈浓，回忆的层次也越来越深刻，从照片又谈到相识的日本反战同盟的朋友。佐藤先生对他们很熟悉，这些人有的已故去，很多人还健在，虽然年事已高，但仍然十分活跃。这些当年的反战同盟成员每年都要聚会三至四次。佐藤先生还拿出一本书对大年先生说：这本书中有记录反战同盟会员事迹的内容，送给您留作纪念。又说：数十个反战同盟员中，有医务知识分子，更多的是纯朴的青年，他们历尽沧桑，为和平事业做出了贡献。这一段历史有必要记录下来，特别是日共、中共两党恢复关系后，要把不易的和平事业坚持下去，维护持久的双方友好、和平，我们的工作是很有意义的。他还强调说：他不久前刚刚辞去代代木医院总院长职务，正在写回忆录，出版后再送大年先生。由于受脑中风后遗症的影响，他做事吃力，行动迟缓，平日写东西都是他口授夫人执笔。这次他例外地拿起了笔，颤颤抖抖地在封面上题写了自己的名字。字写得很慢，几个字写下来竟用了一两分

钟。看他签名时那种神态，坚定、执着、诚挚，真叫人感动。“这是难得的历史性纪念！”我的心灵又对我下了命令，于是我忙拍了这个镜头。大年先生也拿出他的《抗日战争时代》送给佐藤先生，在扉页上郑重题写了这样几句话：“佐藤猛夫先生指教。55年的老朋友见面，感谢你对我的帮助。”这本论文集是大年先生晚年研究抗日战争历史的心得。1982年在日本发生修改教科书事件，引起中国、东南亚各国以及世界舆论的关注，也引起了大年先生的严重关切。这个在抗日战争洪流中成长起来的八路军战士，不能不把历史研究的眼光转到抗日战争这一段历史上来。从1982年到1996年他发表了多篇有关抗日战争史的论文，引起了国内外的重视。《抗日战争时代》就是这些论文的结集。以后他又组织并主持编写了《中国复兴枢纽——抗日战争的八年》这本学术著作。晚年的大年先生一刻也没有把自己的眼光从抗日战争研究移开过。

一位日本老人，拿出记录他亲身参加的日本军人反战同盟事迹的书，这是他和他的战友用自己的心血撰写的；一位中国老人，拿出一本论述也是他亲身参加的抗日战争的书，这也是他用自己的心血撰写的。两位老人，一位曾经是八路军战俘，一位是八路军军人，而历史的结局却是这位八路军军人怀着深深感谢之情来到日本，拜访这位日本老人。因为这位“战俘”，早已不是“战俘”，而是八路军的一名军医；他为这位中国军人治病，更成为可贵的战友，为了一个共同的理想而战斗的同志。我仔细地领会大

年先生写的“55年的老朋友见面，感谢你对我的帮助”短短的几个字，似乎是一部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史的浓缩。

在结束拜访的时候，大年先生满含深意地对佐藤先生说：“我们都是80多岁的老人了，经历过伟大的时代，经历了历史的变迁，我们所做的是对中国对日本有益的。我们还要为两国人民的世代友好继续做下去，只要一息尚存，就要继续努力。”他祝福佐藤猛夫先生“活到百岁，比一百岁还要长。一百岁是第一步。”佐藤先生对大年先生也表示了同样的祝福，并请大年先生转达对钱部长的问候。

从佐藤先生家出来已近正午，坐在车上，大年先生没有丝毫倦意，我们一路交谈着各自的感受。我感觉岁月虽然把他们从当年的青年时代带人老年时代，但他们的精神绝没有衰老，他们的活力仍然不减当年，他们为理想而奋斗的意志更加坚定。这种意志的铸成，两位老人的经历虽不尽相同，却也如佛家所说：“殊途而同归”。也正因为如此，我也就渴望更多的了解这位日本老人的内心世界，渴望知道他何以能够从一个八路军俘虏变成一个坚定的反战同盟成员、中国共产党党员，回国后又加入日本共产党，继续为他所追求的理想信念努力不懈。

按行程安排，当日下午是日中专家委员会委员的见面。在见面会上，尾形先生在报告会馆日中历史研究中心工作之前，充满感性地讲述上午的事。他讲了佐藤先生的经历，讲了两位老人本可以见面但却失之交臂的1963年，

讲了他未负大年先生所托而找到佐藤先生的喜悦心情。他说：佐藤先生是在八路军教育下开始他政治上的第二人生，并从事反战运动，用他的医术为正义而战。大家都熟知白求恩的故事，觉醒的佐藤正是日本的白求恩。听到他这样评价佐藤先生，使我感到既新鲜又亲切，一种更加渴望了解佐藤先生的心情强烈地撞击着我的心扉。

三

回北京后不久，尾形先生便寄来了刚刚出版的佐藤先生的回忆录《一个幸运的男人》。

翻开书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永井洁先生写的前言。永井洁先生是佐藤先生的老朋友和画家，这本书的插图均出自他的手笔。他这样写道：我的母亲生前非常尊敬佐藤猛夫先生。佐藤先生平时不善言语，看上去是位温和的绅士。他待人谦和、平易近人。这样的人品绝非一朝一夕所养成。

这本书是一部“自传”体裁的日本近代史，描述 15 年的战争史，也是一部从战时到战后发生戏剧性转变的珍贵历史见证。特别是在八路军生活的经历，真是波澜壮阔，意味深长。

这本书不仅叙述了作者自己思想转变的过程，而且还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作者以生动的笔触细腻地描写了那一幕幕令他难以忘怀的经历。

山田一郎（佐藤猛夫）先生，1910年12月28日生于日本神奈川县横滨市。“七·七”事变前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东京大学医学部，就业以后潜心研究医学。1938年5月刚结婚一周，即以陆军军医中尉身份被征召入伍，编入日本华北派遣军，驻扎山东兖州、汶上县等地。1939年8月随部队“扫荡”梁山一带的八路军，被八路军包围，激战一昼夜，日军大队长以下二百人皆覆没；他头部负伤，与另外四名日军一同被俘，两个月后，他在微山湖小岛逃跑，再次被俘。

被俘后，佐藤先生来到河南省涉县漳河河畔的王堡村——晋冀鲁豫八路军司令部所在地。当时，那里已有在数月前被俘的日本兵，接受着“这场战争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的教育。经过学习，他们组成了“觉醒联盟”，后改为日本人反战同盟。那时，他们虽然取名叫“觉醒联盟”，佐藤先生却没有真正“觉悟”，思想上仍然深信这场战争是为了日本，为了亚洲各国和平的“圣战”，不认为是一场侵略战争。

书上说那里有许多关于社会主义的书，包括河上肇的《贫乏物语》、《日本历史读本》、《列宁主义的基础》、《唯物辩证法》以及小林多喜二的小说等。佐藤先生对这些书感到新鲜，起初只是浏览一下，并没有努力地去体会、理解。内心还认为那些参加“觉醒联盟”的人是些无知的日本人，自己决不能放弃自己的信念。

后来，在太行山区佐藤先生患了伤寒病，高烧持续三

天三夜，几乎失去意识。在护士的精心护理下，身体渐渐恢复。从病危到康复，他认为他获得了一次新的生命。尽管如此，他内心里还是认为在这种环境下生活，早晚得死。但有一个问题引起他苦苦思索，八路军为什么那样执着地信仰着共产主义呢？他感到很不解。凭着一个医生的科学态度，他决定不管怎样先研究再说，真的领会不了，再死也不迟。

之后，他阅读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米丁·鲍里索维奇著、广岛安吉译）一书，深深被书中有关物质、空间、时间等这些辩证唯物主义的概念所吸引，并为书中严谨的理论推理所折服，有时还一边读一边做笔记，直至深夜。连打仗行军，这些书都放在他的背囊里，变得破破烂烂了。他仍然十分珍惜地当作宝贝，伴随自己渡过那段岁月。有了这样的基础，过去曾抱着浏览态度读的一些书对他有了更新的吸引力，他重读了这些书，又认真反复阅读了许多新书。1940年到八路军医院工作后，还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以及《新华日报》旬刊等。

随着思想的逐渐转变，他确立了要成为一名共产党主义者的信念。在困难的环境中，他专心致志地为伤患治疗。他用医院里仅有的一台显微镜进行血液、细菌和尿的检查，使用一本德文诊断教科书开展教学工作。这时的佐藤先生已经不是单纯以一位医生在工作，而是以一名反战军人在工作了。

由于日军轰炸、破坏，医院不得不常常转移地方。1940年夏天，被日军烧毁的模范医院修好，他们又回到医院原址羊角村，医院也改名为“白求恩纪念医院”。白求恩于1939年不幸逝世，医院是为纪念这位援华著名医生而改名的。医院的正面，悬挂着白求恩一边吃土豆一边考虑工作的画像。一些介绍白求恩大夫事迹的小册子也多了起来。佐藤先生虽然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白求恩的事迹使他很受感动。用他的话说，“白求恩的事迹是难以用语言来表达的”。

通过学习，他也在考虑“在今天这种困难的环境下，如何才能做好医疗工作”。面对缺少医药的现实，他通过努力，想出了许多办法。如在羊角村，有数十名肺结核患者接受治疗，但只能每日注射氯化钙和进行一般性治疗。他绞尽脑筋，制造出一个像玩具样的人工气胸装置。这种治疗方法对一批有“长征”经历的老干部有显著的疗效，受到他们的表扬。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对治疗精神病佐藤先生是外行，但他利用学生时代所学的知识，使用磺酸胺，试着采取持续睡眠疗法，患者反映效果居然不错。

有一天，挖掘出一个长埋在地下的大药品箱，从里面找出几个布满泥土的小瓶子。佐藤先生看后确定是Light氏染色液，使用它可以诊断各种病症，他高兴得几乎跳起来。使用这种染色液后，医院也开始出现了关于血液化验的书。它对诊断各种血液病发挥了作用，特别是对疟疾和

猩红热病源体感染的分析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这些医疗的经验，经过总结，就成为医务人员和学员们的教材。

1942年春天，佐藤先生被任命为医院的医务主任，每月同院长一起到三个分院巡诊一次。除了听取分院长的近况报告外，还与主治医生商量对危重病人的治疗方案。对于需要做手术的病人，他就和院长亲自实施手术，并提出转院等处理意见。到了晚上，院长召开分院的干部大会，除讨论人事问题外，主要讨论有关物资不足、医疗药品短缺等反映的问题，院长一件件记在本上，最后拿出解决的办法。遇到难题，就要长时间讨论，直到找出解决方法。这种深入实际，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的作风，给佐藤先生很大的启发。每次出席这样的会议，都加深他对八路军的了解。这对改变他的思想起了很大的作用。佐藤先生是一位很善于学习、敢于联系自己思想的人。在这里我特别介绍一下他的一段日记，来说明他的这个特点：

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九日

今天又重温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刘少奇著）一书。读到第十一页第九行的“弄得别人落后甘心……”时，感触颇深。在今天的八路军里，特别是在卫生部门，别人认为我的医术高明，我也自认为比一般的同志技术高，恐怕在晋东南一带也算是屈指可数的医生。我之所以孜孜不倦、干劲十足地工作，是因为在我心中，自己是一位深受别人称道的医生。假如现在有三位、五位、十位比

自己医术还要高明的人，自己这种工作热情还会有吗？想到这里，不禁一身冷汗。这种心态确实存在。

佐藤先生思想改变这样有成效，和他对自己的严格要求显然是分不开的。

1942年6月，佐藤先生郑重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经过一年的预备期（大概就是他在五十多年以后仍然深深记得的“考验”），1943年6月也就是在隘峪口医院给大年先生看病前不久，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在预备期内，他对党的认识又怎样呢？下面再摘录几则他抽空用传单纸背面写的日记：

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九日 于河南省武安青塔

我感到长期以来不彻底的思想意识，好像终于见到了彻底解决的曙光。可以说，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我作为一名日本军人被俘后，在八路军一直接受着共产党的教育，自己不仅在理论上有了相当程度的提高，而且原来的思想意识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动摇。

也许在昨夜的梦中看见了患病的母亲，白天阅读了革命小说《母亲》。阅读《母亲》是偶然的事情。但是，在想念母亲、思念妻子时，我发觉至少现在她们想不到我做了如此无法无天的事，是用不着辩解的事情，向她们做出说明，决不是我的真正目的，而只有成为一名彻底的优秀共产党员，才是对她们最好的解释。在日本劳动大众中

间，有相当数量的人还在为祖国、为天皇陛下而不动摇信念，并把我們视为卖国贼。但是对广大民众能够讲清楚的道路只有一条，就是自己要成为一名彻底的共产党员。舍此还有什么呢？在我们的身后，有无数亲爱的日本人民的总体意志，成千上万的日本共产党员正在积蓄力量，他们高呼着“八路军队伍里的日本同志们，加油！战斗到最后一滴血”。那些兴奋的脸庞，在我的眼前不时地闪现出现。

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二日 于西隘峪口

我想无论如何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共产主义者，要朝着自己认定的真理的道路迈进。

但是，每当想起日本国内成千上万的同胞正在流离失所、家破人亡，特别是男女老少那可怜的爱國心，正在以战胜中国为目标拼命地挣扎着……。想到此处，我认为必须提高进一步把握真理的信念。

拯救我们亲爱的同胞的道路在何处呢？日本帝国主义军部的失败已是既定的事实。为了使军部失败的日子早日到来，为了减少日本人民的牺牲，为了资本主义的崩溃，社会主义社会的尽快来临，我们要加倍的努力工作。

从这里我们看到当时一个共产党人的信念和斗争精神。

际遇很有趣，当年主持他人党转正会议的支部书记曲跻武先生，就是我们单位的一位离休老干部，说起来令人

感到格外亲切。地球真是很大又很小，处处都能遇到老朋友。

作为一个日本籍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佐藤先生与中国革命知识分子有着共同的经历，同处困难的环境，遭遇同样的危险。但这种困难、危险对他又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1943年5月，日军对太行山再次大“扫荡”，反复搜山。他与卫生部工作人员隐藏在山洞里，日军的脚就在眼皮底下，刺刀往山洞里捅。在这种九死一生的险况下，他沉着镇定，不惊不慌，惟一想到的是：如果被日军发现，是喊“中国共产党万岁”，还是喊“日本共产党万岁呢”？他想到，如果真的要牺牲，他要让这些日军知道他是日本人，他是一个日本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看到这里，一个高大的日本人的形象在我的脑海中浮现了出来。我真庆幸自己有机会耳闻目睹这位高大的日本人的风貌。

1944年，在佐藤先生的再三要求下，他被批准赴延安，进入冈野进（野坂参三）任校长的日本工农学校。他掌握了日本将战败的情报，考虑回日本后要为祖国的民主革命贡献力量。从野战总预备医院出发，两个月后的12月9日到达延安。第二天便拜访了住在王家坪的冈野校长。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他同工农学校的高山教务主任参加旁听。“八·一五”日本投降，他已是要回国的冈野进的三名助手之一。临行前，毛泽东主持，朱德、周恩来作陪，为他们举行了告别宴会。之

后，他们一行四人从延安乘飞机至东北，转往莫斯科，1946年1月经朝鲜回到日本。1946年2月10日加入日本共产党，后来在三田医院任内科医生，同时经常受邀请参加座谈会和演讲会，并翻译中国共产党的文献。后由三田医院辞职，创办日共管理的东京代代木医院。办医院的同时，他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在战争中从事反战活动的日本军人回国以后，组织起“八四友会”（取八路军、新四军各一个字命名），追求和平民主，反对军国复活主义。日本投降50周年，“八四友会”出版《战争体验》专刊，其中叙述成员们的主张和目标说：我们之中的很多人以前被欺骗，为日本军部侵略中国所利用，自从作了八路军、新四军的俘虏，我们认识到了侵略战争的本质。为了实现中日两国的和平，我们在中国的战场上，与中国人民并肩作战，冒着生命危险，参加了反战活动。“战后，日本与世界形势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这期间的日本历届政府，一不承认过去的战争是侵略战争，而是跟在美国后面企图推进军国主义复活，扩大向海外派兵。我们一定要阻止日本再次踏上悲惨的战争之路”。

“八四友会”的成员们反对当局篡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主张中日两国人民和平友好相处，这与日本众多抱有良知的国民、占主流地位的历史研究者的认识是一致的。但是，侵略战争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他们来自血与火交融的战场上，来自对中国人民家破国亡、灾难痛苦的亲见亲闻，这使他们又是具有独特条件来认识侵略战

争的本质。佐藤先生是“八四友会”活动的组织者、推动者之一。1983年、1987年，他先后发表文章，指名批评中曾根。他说自己在青年期间，认同了“为日本而战”的欺骗民众的帝国主义思想，那种思想和独裁制度非常可怕。“中曾根内阁提出战后政治总决战的口号”，反动活动猖獗，应该与这种反动活动斗争到底。他回忆说，在“八·一五”日本投降后，欢送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学生回国的会上，周恩来曾说：各位回国，我们没有赠送什么珍贵的礼物，“我们送去的，是为建设新日本而发挥作用的青年”。佐藤先生正是这些青年中的一分子。他和他的同志，是日本法西斯给自己播种下的否定自己的充满活力的种子。

佐藤先生在“后记”里讲述了书名《一个幸运的男人》的来历。他说，那个时代的青年，被拉到违背自己意志的战场上，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家都遭到了恶运，许多人成了天皇制咒语下的牺牲品。相反，回顾自己选择的后半生，由衷的感到满足。后半生给自己带来了好运。

读罢佐藤先生的自述，不知是出于巧合，还是作者有意安排，我相信是作者有意的安排。书的来页标明出版时间是1998年12月28日，而88年前的这个日子正是佐藤先生诞生之日。我想，他是想以此对自己人生作一总结。这使我在初闻尾形先生说“佐藤先生是日本的白求恩”时产生的那种新鲜感之外，更增添了一份由衷的敬仰。他和白求恩都是外国人，都是医术高明的医生。白求恩是加拿大的共产党员，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不远

万里来到中国，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佐藤先生则是为侵略者到中国来打仗，经过反省成为正义之士，在战火中经受考验，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用他的医术服务于抗战。一个日籍中国共产党党员，用他的医术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这难道不是日本的白求恩吗？

四

大年先生回国后，很想把他同佐藤先生重逢的消息告诉钱部长。

1999年1月，一个寒冷的日子，我陪大年先生如约来到了钱部长的家。这是一个整洁的院落，漆着砖红色的铁门，一排南房，二间西房。钱部长亲自出迎大年先生到作为书房的西屋。今年已87岁的钱信忠部长，身材硕健，一点也看不出那个年纪的人常见的龙钟老态。落座后，大年先生拿出我已加洗好的照片给钱部长看。他看得很仔细。在他看照片的时候，我环视了一下这间书房，有窗的那面墙呈半圆形，靠墙摆着几把藤沙发，沙发两边各放了两个花架，靠右侧墙摆着一个较大的写字台。一组书柜把这间厅和里厅隔开。窗台上摆着干花和一些奖状。其中有一铜制奖状用篆书写着八个大字“德高望重，功同医相”。“功同医相”出自范仲淹的“不为名相，即为名医”，即不能在仕途上有所成就，就要做一个有名的医生，为社会服务。“功同医相”即称赞钱部长无论是做领导还是做医生，

都表现很出色。大年先生问钱部长“看出来他那个样子吗？”钱部长说看出来了。接着大年先生讲述会见佐藤先生的情况。钱老回忆说：那时医院里有两个外国人，一个德国人，很好，但年轻，是来实习的；另一个就是佐藤先生，他很有经验，在医院里，外科手术我自己做，内科由他主治，很负责任。大年先生对当年钱部长在没问病情，也没有仪器的情况下，果断地做出诊断很感纳闷。钱部长说：你那么吐法是血管破裂的吐法，又没有肺空洞。联想看到的奖状，钱部长确实医术高明。接着，大年先生又谈到尾形先生在会上宣布说佐藤先生是日本的白求恩，钱部长认为“可以这样说”。这是又一位中国老人、佐藤先生的老上司对佐藤先生的高度评价。

告别了钱部长，在送大年先生回家的路上，三位老人——两位中国老人，一位日本老人，轮番地出现我的脑海中。我突然觉悟到，这不就是一部近代史，一部抗日战争史的缩影？我转眼望视大年先生，似乎看到的不仅是学者的大年先生，还看到老八路军的大年先生。我对自己说：唔！这就是我原来所朦胧认识的战士型史学家。

附注：白阿胶，中药之一种，原产于山东。系用驴皮熬成胶，有滋补养血效用。或叫作驴皮胶。

（本文原载于台湾《近代中国》第133期）